

检察机关服务保障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问题与路径



林鼎立

依法履职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是检察机关以高水平法治护航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广西检察机关坚持以依法办案为基准,以检察改革为动力,以职能延伸为补充,多措并举,积极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助推广西跻身2023年度优化营商环境进步最明显的省份行列。

聚焦自治区党委加快推进“一区两地一园一通道”建设战略部署要求,广西检察机关在全面依法履行法律监督职能,更好为各种所有制经济发展壮大提供平等依法保障方面,还存在一些短板:

一是工作理念创新不够。个别办案人员对于上级有关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政策文件精神及相关部署要求理解把握不够精准,办案过程中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有差距,对服务保障和高质量发展系统谋划不足。

二是履职效能有待强化。目前检

察机关主要通过履行刑事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一些基层院在涉案企业财产刑执行、查扣扣、“空壳”公司等专项治理过程中,不善于借助数字监督模型,甚至仍采取逐案排查方式摸排案件线索,数字赋能法律监督成效不够明显。

三是协作机制有待完善。从司法实践看,在服务建设法治化营商环境过程中,个别检察机关与法院、公安以及相关政府职能部门之间信息互通、协作联动机制不够健全,尚未形成强大工作合力。

四是履职效能有待提升。随着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经济犯罪特别是金融领域新型类型新难点不断涌现,对办案人员的履职能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知识结构、办案经验等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短板和不足。

针对上述问题,有必要立足本地实际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论证提出检察机关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的系统化、科学性的对策建议。

一是深入践行科学司法理念。持续深入学习、一体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法治思想,切实增强检察履职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的自觉,重视并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动解决制约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坚持“三个善于”“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涉企案件,始终坚守严格依法底线,严格遵循法律规

定并深入考察法律规定背后的法的精神,准确把握法律政策界限,特别要严格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统筹考虑涉案企业自身主观恶性以及政策调整、市场风险等市场主体

意志以外的其他因素,全面、准确、合理认定其不当行为的社会危害性,确保办案“三个效果”有机统一。

二是注重提升法律监督质效。创新定期研判侵害企业合法权益犯罪新动向机制,依托专题调研,深入分析成因,提出企业对策,依法维护健康市场秩序和优化营商环境,健全依法监督与协作配合实质化、规范化、体系化运行机制,进一步完善办理重大企业犯罪案件适时介入工作机制,不断提升指控、证明涉企犯罪的能力水平,促推执法司法活动始终依法依规范进行。积极联合公安机关开展专项行动,持续深入推进涉企“挂案”清理工作,有效监督纠正和防范以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加强涉企案件查封、扣押、冻结不规范问题监督,依法监督纠正侦查机关对与案件无关的财物进行“查扣冻”,对不宜查封、扣押、冻结的经营性涉案财物,在保证侦查活动正常进行的同时,应当允许有关当事人继续使用,以维护涉案企业正常经营秩序。深入探索知识产权检察职能整合、人员配备、履职方式、专业化建设等制度机制,持续推进知识产权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职能融合履职,着力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性司法保护整体效能。强化数字检察赋能法律监督,深度挖掘内外部涉企案件线索,及时通过制发检察建议等后续监督手段,督促有关管理部门加强管理和跟进指导,通过个案办理推动类案监督,从而实现系统治理、源头治理。

三是加快形成协同工作格局。积极推动将法律诉求全过程司法信息纳入政法跨部门大数据办案平台,打通与公安、法院、行政机关涉企执法司法

信息数据壁垒,实现办案信息互通共享、政策措施联动。进一步优化和整合检察机关与行政机关以及各类社会团体组织的资源和优势,完善检察机关部门之间常态化的线索通报、证据移送、案件协查、联合执法等办案协作机制,进一步做实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双向衔接机制,形成更加系统、科学、全面、高效的经济社会矛盾纠纷联动解决机制,努力做到严格依法与做实平等并重,采取强制措施、强制性侦查措施与维护涉案企业正常秩序、合法权益并重,打击经济犯罪、职务犯罪与依法帮助企业挽回和减少经济损失并重。

四是重视加强专业人才培养。主动适应经济犯罪新发展态势,加快建立健全经济犯罪案件专门人才库,采取同堂培训、专题研讨、科技讲座、以案代训等多样化方式,不断拓展专业人员的知识结构,提高新业态背景下的办案能力,切实发挥专业人员在打击经济犯罪、维护经济安全方面的示范引领作用。另外,为适应我国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需要,建议将涉外检察人才培养纳入刑事检察业务条线培训计划,为高素质办好涉外刑事案件,提供专业人才支撑。

(作者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本文系2024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应用研究课题“服务保障法治化营商环境检察履职研究——以广西检察机关为例”阶段性成果)

定犯罪集团,犯罪团伙的运营模式以确定涉案人员承担法律责任的范围,犯罪嫌疑人在犯罪团伙中地位作用的供述,以及对每一个同案犯的指认。在此基础上,即以梳理出该犯罪团伙的组织架构、人员分工及具体人员作用,从而方便准确划分层级,合理确定处理方式。以W区检察院办理的一起案件为例,公安机关共抓获103名犯罪嫌疑人,检察机关在引导公安侦查划分层级后,建议公安机关将地位作用较轻、划分为第四层级的79名犯罪嫌疑人直接报捕或依法作出行政处罚,有效节约司法资源。

第二,准确认定量刑情节,精准定罪量刑。因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涉案人员多,公安机关首先会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案以节约司法资源,这涉及自首情节的认定。实践中对于电话通知到案属于“自动投案”已无异议,笔者认为,公安机关电话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案的事实仍应作为判定自首情节的重要标准,即只有在明确告知犯罪嫌疑人因涉嫌要求其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时,才足以反映犯罪嫌疑人认罪悔罪态度及到案的主动性。在量刑情节的认定上,均应当坚守立法原意,维护法的权威。

当前,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依然严峻而复杂,且犯罪手段和犯罪方式不断升级,司法人员应客观全面查清案件事实,准确认定涉案人员行为性质,坚持宽严相济,才能真正发挥法律的震慑作用。

(作者李耿东为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党组书记、副检察长,张晓婧、蒋昊望为武汉市武昌区人民法院四级检察官助理)

在量刑证据上的证据审查要点

第一,合理区分主次犯,分层分策处理。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涉案人员规模大、分工明确、层级多,有必要根据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层级、区分主次犯,并依法分层分策处理。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在依法介入阶段提出明确的引导侦查意见,建议公安机关通过重点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分工以

为推荐诈骗平台、引诱被害人加好友,发送诈骗平台链接及指导被害人注册、充值、提现等信息,更有利于确保认定犯罪嫌疑人构罪的标准于法有据、客观公正。

第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认定。当诈骗分子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主要在于“30日”的认定。以近期开展的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为例,犯罪分子大多从诈骗窝点被缅甸军方抓获后遣返回国,其在境外诈骗窝点中工作的时间难以查证,其从事的工作是诈骗活动且达30日以上,构成犯罪的,难以形成犯罪链条,难以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节点模糊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串并案,锁定犯罪集团,以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推定具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讯问中下功夫,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经历、其本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工作内容及同案犯的供述,来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

办案手记

口述/徐大伟 整理/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何芳莉 张雨农

9月14日,在值班律师的见证下,常某自愿签署了认罪认罚具结书。

施法于人,虽小心慎。从事刑事检察工作20余年,我一直与形形色色的案件打交道,办理过社会舆论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对嗜毒嗜赌、杀人犯挑衅的眼神,经历过同时与十几名律师唇枪舌剑,但记忆最为深刻的并不是大要案办理成功的高光时刻,而是寻常小案中的柳暗花明。

3月4日中午,常某驾驶一辆蓝色小轿车,搭载一名搬运工,从河南省汤阴县相帮的鹤壁市山城区石林镇苗某家中,趁苗某在家中睡觉大门未锁之机,谎称搬家需要电动三轮车,让搬运工帮她把朋友家的电动三轮车骑走。随后,常某采取搬运工在前面骑行涉案电动三轮车,其驾驶小轿车在后面跟车的方式,将苗某停放在院内的电动三轮车偷走。

当天16时,苗某睡醒后发现停放在院内正在充电的电动三轮车不见了,以为是被亲戚朋友开走使用,所以并未第一时间报警。但之后一直未有人归还,经找寻无果后于3月7日报警。

公安机关于当日立案侦查,并对案发现场进行了勘验,从道路监控视频中发现,被盗电动三轮车由一男性犯罪嫌疑人骑行并驶向汤阴方向,一辆蓝色小轿车跟随其后,速度较慢,并非正常行驶的车辆。公安机关通过小轿车车辆信息查询到常某,并于立案当日将常某抓获到案。

3月14日,公安机关以常某涉嫌盗窃罪将该案移送我院审查逮捕,我负责办理该案。我对盗窃现场照片、常某行车轨迹、被盗电动三轮车购车凭证等证据,以及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常某的供述与辩解、鉴定意见、现场勘验笔录、监控视频等证据进行了仔细审查,在脑海中推演犯罪事实发生经过。

常某在审查逮捕期间的供述和在公安机关的供述一致,结合常某之前两次因为盗窃被判处有期徒刑的犯罪前科,我院对其批准逮捕。按照以往的办案经验,我认为这不不过一起普通的盗窃案件,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公安机关将该案移送审查起诉后按照程序依法提起公诉即可。

然而,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过程中,常某突然改口,称自己是借用电动三轮车而非盗窃,当时借用电动三轮车时被害人在场,在某被抓获前已经电话联系被害人返还电动三轮车,且曾通过中间人调解,希望被害人撤回报案,其认为这是一个“误会”。

这一突如其来辩解,并未让我感到意外,因为很少有犯罪嫌疑人愿意积极地去承担刑事责任的后果,他们总是作一些辩解,试图减轻自己的责任或者逃避自己的责任。

我对现有证据重新作了梳理,列出了需要继续补充侦查的事项,包括案发前后常某的通话记录、案发后被害人是否接到过常某的电话、是否知悉调解事宜的证人证言等。

随着补充侦查的进行,新的证据逐渐浮出水面。常某提到的通话记录确实存在,这让她“借用”电动三轮车的辩解似乎有了一定的依据。然而,我深知作为检察官,不能仅凭犯罪嫌疑人的一面之词就轻易下结论。

于是,我再次要求公安机关进行补充侦查,主要方向是调查中间调解人的证言,是否存在1300元赔偿事宜,同时要求提供通话记录时间常某的位置信息,以及她在前往中间人处调解时有没有归还电动三轮车。这一系列的侦查工作,都是为了进一步查清常某的行为性质,究竟是盗窃还是借用。

经过审查,我发现常某的辩解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她声称是借用电动三轮车,她是向谁借用?如果是向苗某借用,经查,两人虽然认识,但案发前半年内无通话记录,最近一次通话记录是在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为何案发前一天,手机基站信息显示她出现在被害人所在村庄?既然是借用,为何被害人会报警?既然是借用,还车即可为何还要额外赔偿损失?为何不在借用完毕后及时归还?这些矛盾之处,让我更加坚信常某的行为构成盗窃。

我耐心地对常某进行释法说理,向她详细讲解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最终,在证据面前,常某如实供述,她在案发前一天到过苗某所在村庄,发现苗某家停放了一辆新的电动三轮车,因为知道苗某独居,并且有平时不锁门的习惯,她便在次日偷走了苗某的电动三轮车。

7月5日,我以涉嫌盗窃罪对常某提起公诉。法院综合考虑犯罪性质、情节、社会危害程度,结合认罪悔罪态度,以盗窃罪判处常某有期徒刑十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

这起案件虽然看似普通,但在办理过程中却让我深刻体会到了“小案亦需精办”的重要性。每一个案件都关乎着法律的尊严与公正,关乎着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作为检察官,我们不仅要到大案要案保持高度的警惕和严谨的态度,更要对小案件给予足够的重视和精细的办理。因为,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案件,才构成了我们检察工作的基石,才体现了我们法律人的专业与担当。

(口述人系河南省鹤壁市山城区人民检察院刑事检察部主任)

究竟是谁偷还是借

常见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证据审查要点

李耿东 张晓婧 蒋昊望

络诈骗犯罪案件为例,论述不同情况下犯罪金额的认定情况。

第一,在一审案件中,公安机关通过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梳理出13个用于接收诈骗资金的一级账户,结合在案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了解到,该诈骗集团内部有专门负责洗钱的人员,且上述账户内资金进出频率在犯罪集团成立后呈现明显界分。基于此,检察机关判断上述账户为该诈骗集团独立使用的账户,则诈骗集团在存续期间,上述账户内的资金均可以认定为诈骗集团的诈骗金额。

第二,在二审案件中,公安机关根据被害人提供的转账记录共梳理出69个一级账户,但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使用的收款账户由洗钱公司提供,公司老板定期到洗钱团伙领取现金,即洗钱环节外包,无法将上述账户内的资金直接认定为案件的犯罪金额。检察机关引导公安机关通过银行流水显示的汇款人倒查被害人,将同时符合诈骗平台、诈骗人员使用身份、诈骗话术一致的被害人认定为本案的被害人,再调取被害人提供的银行转账记录,汇总制作包含每一笔转账时间、金额的汇总表,以查明被害人的转账金额认定诈骗集团的犯罪金额。

通过上述对比发现,准确认定犯罪金额在证据审查上的关键,首先是明确用于接收诈骗资金的账户与犯罪集团间的紧密度,对于存在账户混用情况的,再通过银行流水倒查被害人,实现被害人与诈骗集团犯罪行为的一一对应,从而确定最终犯罪金额。

第二,在发送诈骗信息条款认定诈骗未遂时诈骗信息的认定。当前网络即时通信中,信息简短,多有寒暄、情感铺垫等内容,若将全部内容计数并不合理,综合考虑以行为人发送的信息条数(扣除与诈骗行为无关的信息)认定更加符合立法本意,同时将诈骗信息界定

为推荐诈骗平台、引诱被害人加好友,发送诈骗平台链接及指导被害人注册、充值、提现等信息,更有利于确保认定犯罪嫌疑人构罪的标准于法有据、客观公正。

第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认定。当诈骗分子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主要在于“30日”的认定。以近期开展的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为例,犯罪分子大多从诈骗窝点被缅甸军方抓获后遣返回国,其在境外诈骗窝点中工作的时间难以查证,其从事的工作是诈骗活动且达30日以上,构成犯罪的,难以形成犯罪链条,难以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节点模糊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串并案,锁定犯罪集团,以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推定具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讯问中下功夫,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经历、其本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工作内容及同案犯的供述,来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

在量刑证据上的证据审查要点

第一,合理区分主次犯,分层分策处理。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涉案人员规模大、分工明确、层级多,有必要根据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层级、区分主次犯,并依法分层分策处理。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在依法介入阶段提出明确的引导侦查意见,建议公安机关通过重点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分工以

为推荐诈骗平台、引诱被害人加好友,发送诈骗平台链接及指导被害人注册、充值、提现等信息,更有利于确保认定犯罪嫌疑人构罪的标准于法有据、客观公正。

第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认定。当诈骗分子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主要在于“30日”的认定。以近期开展的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为例,犯罪分子大多从诈骗窝点被缅甸军方抓获后遣返回国,其在境外诈骗窝点中工作的时间难以查证,其从事的工作是诈骗活动且达30日以上,构成犯罪的,难以形成犯罪链条,难以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节点模糊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串并案,锁定犯罪集团,以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推定具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讯问中下功夫,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经历、其本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工作内容及同案犯的供述,来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

在量刑证据上的证据审查要点

第一,合理区分主次犯,分层分策处理。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涉案人员规模大、分工明确、层级多,有必要根据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层级、区分主次犯,并依法分层分策处理。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在依法介入阶段提出明确的引导侦查意见,建议公安机关通过重点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分工以

为推荐诈骗平台、引诱被害人加好友,发送诈骗平台链接及指导被害人注册、充值、提现等信息,更有利于确保认定犯罪嫌疑人构罪的标准于法有据、客观公正。

第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认定。当诈骗分子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主要在于“30日”的认定。以近期开展的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为例,犯罪分子大多从诈骗窝点被缅甸军方抓获后遣返回国,其在境外诈骗窝点中工作的时间难以查证,其从事的工作是诈骗活动且达30日以上,构成犯罪的,难以形成犯罪链条,难以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节点模糊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串并案,锁定犯罪集团,以犯罪集团的犯罪行为推定具体犯罪嫌疑人的行为;另一方面,要在讯问中下功夫,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在境外的经历、其本人在犯罪集团中的工作内容及同案犯的供述,来判断其供述的真实性。

在量刑证据上的证据审查要点

第一,合理区分主次犯,分层分策处理。对于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集团,涉案人员规模大、分工明确、层级多,有必要根据涉案人员的地位作用合理划分层级、区分主次犯,并依法分层分策处理。对此类案件,检察机关应在依法介入阶段提出明确的引导侦查意见,建议公安机关通过重点讯问犯罪嫌疑人,查明四个层次的内容,即犯罪团伙的组织结构、人员分工以

为推荐诈骗平台、引诱被害人加好友,发送诈骗平台链接及指导被害人注册、充值、提现等信息,更有利于确保认定犯罪嫌疑人构罪的标准于法有据、客观公正。

第三,“一年内出境赴境外犯罪窝点累计时间30日以上”的认定。当诈骗分子在境外从事诈骗犯罪且诈骗数额难以查证时,可以根据“两高一部”《关于办理跨境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规定认定诈骗罪。目前司法实践中适用难点主要在于“30日”的认定。以近期开展的打击缅北电信网络诈骗专项行动为例,犯罪分子大多从诈骗窝点被缅甸军方抓获后遣返回国,其在境外诈骗窝点中工作的时间难以查证,其从事的工作是诈骗活动且达30日以上,构成犯罪的,难以形成犯罪链条,难以形成犯罪团伙的时间节点模糊事实。针对这一情况,司法机关一方面要善于通过串并案,锁定犯罪集团,以犯罪